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少

张宏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比韩国人好什么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张宏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 张宏杰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0

ISBN 7-5034-1567-3

I. 中… II. 张… III. 社会发展 - 对比研究 - 中国、
韩国 IV.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3934 号

责任编辑：张建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100811

印刷装订：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开 本：889 × 1230 1/32

印 张：7 彩插：15 幅 字数：12.7 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1

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观察韩国如何控弃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它的经验,知道它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19

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 35

为曾经有过这样的遐想:是韩国人截取了一脉黄河上游之水,注入了汉江。由于水短流急,地处偏僻,使鸭绿江大部分水流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临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有过一段接触之后,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单纯,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 69

凡是韩国人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实际的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范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相当考究，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内一些乱糟糟的仿古仪式。

民族主义在韩国 87

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当天，20名韩国青年聚集在汉城独立门，一起砍下自己的一节手指，包在国旗里，寄给日本驻韩大使馆，以示抗议。韩国政府也立刻配合民众情绪，发出强硬的声音，总统和议长都发表强硬声明，强烈批评小泉的作法。

韩国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 103

韩国的《公职人员伦理法》第二章《财产申报和公开》的主要内容部分约为一万字。规定的申报内容为本人、配偶和直系亲属的财产。财产既包括房地产、现金、存款、证券、股份，也包括宝石、古董、艺术品。伦理法详细规定了对上述财产进行审查的权限。比如，可以“要求金融机关的首长提出关于金融往来内容的资料。此时，金融机关的人员不得拒绝”。

重本还是重末：中韩教育政策之比较 129

韩国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上也有不平衡性，不过他们的不平衡方向与中国相反。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在推行初中义务教育时，免费的范围明确规定由偏僻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

韩国是怎么解决农村问题的 141

新村运动是在小农制背景下搞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触及农民的产权，土地依然是农民的私产，生产经营权掌握在农民手里，农民的服从一是因为看到了好处，二是因为服从政府的习惯，而并不是因为后面有强迫使然。因此，运动不可能成为破坏性力量。

独岛的光荣 157

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直到1956年，韩国政府从韩战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上岛，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土护国大业”。韩国政府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

“韩流”兴起的秘密 161

韩国电影里面，总会有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对弱者的关爱，或者对社会的奉献思想。韩国电影对于自己民族文化、民族内涵的表现上，一直都给予比较多的注意。《爱有天意》影片拍得那么大气，画面那么美，那么干净，尽管是表现爱情的，但是非常典雅，表现了东方人的情感。

汉城散记 173

韩国车多，公路上从来都是车满为患，可是没见到一个违章的，车流滚滚而塞车情况很少发生。在会车之际，经常看到两车互相谦让。回国之后，两天之内我见到了四次闯红灯，其中两次是我坐的出租车，至于抢道，违章并线，违章调头，一路皆是。

厕所是个被谈烂了的题目。外国人谈，中国人也谈，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更要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比较厕所学”，厕所被当成了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表征。有人从北京人早上边排队上厕所边聊天解读东方的日常生活伦理，有人从中国公厕的开放性解读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意识，有人从中外厕所的外表差距解读中外文化的“象征意识”和“实用意识”的差别。似乎“厕所”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读角度。结论大致是，只有当中国文化的“总病根”被彻底挖出斩断，中国人改变了“民族性”，中国的厕所才能彻底没有臭味。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代序)

不一样的日本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 40 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余年后的 1949 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1898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20世纪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学习一切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是不可取的。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

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历史上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将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

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解放前的旧中国像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的旧观念之下，禁锢在僵化的专制政体枷锁之中，依靠腐败、疲塌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古代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曾长期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

引。它曾经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也像宋朝太祖赵匡胤一样，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 16 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

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朝鲜半岛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倔强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国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古代朝鲜统治集团在“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

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作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半岛社会存在着许多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文化基因,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观察韩国如何摈弃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它的经验,知道它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领先与落后:三百年间三篇游记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某些中国游客

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为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先进的中国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棚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序亦精丽如画。”

恐怕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用“精丽如画”这个词来形容“柴堆粪序”吧。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匾，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当时的朝鲜半岛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清代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而 113 年之后的 1893 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

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半岛，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口。”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当时的朝鲜半岛还实行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 1961 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